

# “家长主义”时代家校的权利边界、 互动机制与教育公平

赵同友

(温州大学 教育学院, 温州 325035)

**摘要:**全球教育的结构性变动, 市场经济和技术的快速发展, 再次突显家长在子女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家长主义”时代的到来, 成为重构家校权利关系、追求教育公平的良好机遇。然而, 藉由技术中介主导下的学校治理, 建立不平等的权力控制机制与家长互动, 把家长培养成为自我改造的知识主体, 引发了家长间的相互监督与竞争, 强化了教育的文化与社会再生产功能。故而, 需要在理论和规范上厘清家长和学校的权利边界; 要从根本上反思学校灌输给家长知识的性质, 鉴别知识的教育性与非教育性; 赋权家长, 在家长群体内部发展“公共家长”, 减轻教师负担, 创造公平的教育环境。

**关键词:**家长主义; 家长参与; 家校互动; “公共家长”; 教育公平

**中图分类号:** G6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6762(2022)01-0041-09

中国正在经历一个大规模的家长参与子女教育(以下简称家长参与)并影响教育公平的时代。家长参与反映了家长对教育意义的认同, 也折射出他们作为具有血缘关系的“重要他人”, 意图通过教育帮助子女获得重要社会资源的内在焦虑。然而, 现代学校作为一种刚性制度存在, 不仅有其独立的运行体系, 也与家长形成了不平等的权力关系<sup>①</sup>。学校教育的这种特征, 不仅影响了家校互动的权力机制, 而且对社会经济地位差异巨大的家长群体产生了特有的压力和社会效应。所以, 如何认识家长参与、家校互动机制及其教育公平内涵是必要且重要的。

1990年, 英国学者布朗(Brown)撰文称, 英国教育的发展正在进入“家长主义(Parentocracy)”的“第三波浪潮”, 即世界教育从19世纪末的第一波“大众化浪潮”, 过渡到20世纪前叶的“精英主义”浪潮, 逐渐进入到一个孩子的教育越来越依赖家长财富和愿望(the wealth and wishes of parents), 而非他们自己的能力与努力(the ability and efforts of pupils)的时代。<sup>[1]</sup>“家长主义”并不是家长促成的, 家长的权力也没明显增加, 只是政府借市场之名, 在教育市场化、家长择校、个体自由的名义下推动的一场教育

收稿日期: 2021-09-01

① 本文在法律和规范意义上使用权利, 在力量支配的证成意义上使用权力。教育权力的不恰当设定与行使, 有侵害教育权利的可能性。“如果缺乏对教育权力的必要警惕, 那么权力就有异化为压制性暴力的可能性。”详细参见于浩, 郑晓军:《教育权力的法理基础》,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1年第8期。因此需要在描述和论证教育权力的基础上规范教育主体间的权利边界。

改革。决定学校课程和评价标准的依旧是国家，教育竞争的结果则掌握在家长手中。家长主义意味着教育选择的基础发生转变，教育的公平受到挑战。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等趋势加剧，教育的回报率增高，除了少数国家的家长外(如荷兰、瑞典)，多数国家的家长都认同“密集型育儿”带来的好处<sup>[2][14]</sup>，并以“虎妈”“鸡娃”“直升机妈妈”的姿态参与到子女教育中，由此拉开了“家长主义”时代的序幕。

## 一、家长参与权利转换的基本进程

本质上而言，家长参与是一种代理行动，它是家长作为他者参与子女教育而意欲达成子女教育目的的行动。<sup>[3]</sup>因此，需要对不同社会、不同时期家长代理行动的合法性基础，特别是权利关系进行考察。从教育发展历史的源流考察，当教育发生在家庭或者临近的相关场所时，家长作为教育者或者教育的“消费者”，对子女的教育具有主导权。中国在夏、商、周时期，就有世代相传的“畴人之学”，通过家庭传授生产、道德与专业技术知识。“为官之父兼而为师，传其所学；官之子就其父学，学习为官。”<sup>[4]</sup>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宗族衰落，家长权威上升。《墨子·天志上》说：“恶有处家而得罪于家长而可为也？”可见家长权力的急剧上升。《韩非子·忠孝》言，家长“夜寝早起，强力生财，以养子女臣妾”，表明家长处理事务的范围与权利扩大。在科举制度贯穿的社会里(607—1905年)，接受教育(权利、目的和内容)的主导权仍由家长控制，没有代表国家的制度性机构系统接管教育权。在工业革命前，西方社会的教育主要以学徒制方式实施，家长决定儿童学习的内容，比如，家长经常决定男孩应从事何种职业。学徒制主要聚焦于家务活和家庭手工业，绝大多数儿童都是从父母(或师傅)那里学会如何谋生的。在经济机会和社会流动开放的工业革命之前，西方教育整体上以子承父业的社会复制方式进行。<sup>[5]</sup>这一时期，家长参与是基于血缘关系的自然代理，而非基于法律关系的法人代理。这里并不存在一个行动者对另外一个行动者的权威授予。因此，在制度性的学校教育出现之前，家长是作为主导者而非协助者参与子女教育的。

17世纪，伴随着欧洲社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宗教势力的衰退，教育逐渐从私人 and 宗教领域脱离出来，由国家接管，设立义务教育制度，形成了国家-个人之间的契约关系。当家长把子女送入学校，家长作为行动者个人，放弃了控制自身某些行动的权利，因而成了被支配者；与此同时，学校教育实体内的所有成员(包括教师、家长、学生、教育行政官员)基于某种共同规范，达成共识，学校“作为集体或法人行动者”，成为支配个人行动的集体。<sup>[6]</sup>因此，从权利授予和制度接管的角度分析，无论是外文表述中的“parent involvement”<sup>[7]</sup>“parental engagement”<sup>[8]</sup>parental support，还是 parental participation，家长参与的内涵已经窄化为家长围绕子女学校教育表现出来的行动和信念。<sup>[9][10][11]</sup>

经由这种历史变迁，家长完成了从子女教育主导者到协助者的转型，主要经由学校教育参与子女教育的社会格局形成。这一转型，从结构上建构了国家-学校的权力支配地位，家长则成为学校和教师之外具有附属地位的人员。不过，从20世纪80—90年代开始，政府的政策话语体系中逐渐开始出现“赋权(empowerment)”的字眼。在教育领域中，“赋权”家长成为提高学校教育效益的有效策略。<sup>[12]</sup>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终身教育思潮的席卷，教育成为个人选择的商品和不断学习新技术以适应社会发展的工具。家长因而转变为“消费者”，具有选择和购买教育产品的自由。<sup>[13]</sup>在东亚地区，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其衍生的规模庞大的课外教育市场(影子教育)<sup>[14][15][16]</sup>，造就了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消费者的

家长——他们拥有了更多选择教育商品的自由。在公共学校教育之外，家长增加了私立学校、课外教育或者留学的选择权。新的社会结构变动增加了家长的话语权，进而对传统社会的学校教育模式形成新的挑战。柯林斯(Collins)和哈尔弗森(Halverson)认为，在新的技术时代，家长或个人将重新成为教育的主体，获得更多的教育主导权。<sup>[17]</sup>由此，家长参与的意义再次突显出来。

不过，“赋权”家长很可能成为赋权个人的个案秀，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学校和家长间的权力关系。<sup>[12]</sup>技术的发展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显现出明显的负效应。特别是随着技术应用的日常化，学校能够借助技术越来越有效地控制家长参与，技术本身演变为权力控制机制。这种机制的形成，既有学校作为权力主体，以技术为中介，制造利于学校治理的动因所在，又有家长作为觉醒的群体，意识到教育即竞争并主动参与其中的缘故。家校互动藉由技术普及，演变成为一种新式的权力控制机制和竞争格局。

## 二、“广场-全景敞视”：家校互动的权力机制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到了现代社会作为公共景观的惩罚逐渐消失，代之以一种隐秘的、由专门机构专业人员操控的自动“全景敞视”的控制机制。如果把公共景观式的监控机制称为“广场奖惩”，自动化的权力控制可以称为隐秘式的“全景敞视”操控。“广场奖惩”具有示众性，权威者对个体实施奖惩的同时，强化了集体意识。“全景敞视”监控则通过分层监督、规范化评判和检查等手段，对群体进行区分、同化和排斥，形成了自动化和非个人化的权力监督机制。

从家校沟通的机制和路径分析，现代社会的家校沟通具备“广场奖惩”和“全景敞视”的双重监控机制(以下简称：广场-全景敞视)。一方面，家长与教师以班级为单位建立的信息沟通平台(如微信群、钉钉群等)，形成了一个清晰可见的“信息广场”。“广场”中公布的信息及其携带的价值都具有明显的“示众效应”。另一方面，教师公布的信息及其包含的对学生学业表现的规范评判和等级划分形成了一种自动监控机制，让家长和学生同辈群体中形成了清晰的位置感并不断做出调整。“信息平台”成为一个“示众广场”，也成为一个观察和记录知识的机器，不断地对学生进行登记、评估和分类。

如果以学业表现作为规范化评判的主要标准，那么学生学业表现所代表的位置和家长的参与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作为“一种虚构的关系产生一种自动的征服”<sup>[18]227</sup>。通过发布学生每日的学业状态，教师在家长身上造成了一种责任意识和持续的可见状态。明确的学业状态描述了“谁在哪里，他为什么在这里，他应该在哪里”的知识判断，贴上“优秀”和“落后”的标签。正如福柯所言：“各种纪律使用分割和垂直方法，它们对同一水准的不同因素进行尽可能牢固的区分，它们规定了紧凑的等级网络，总之，它们用连续的、区别对待的金字塔技巧来对付复杂人群内部的反向力量。”<sup>[18]246</sup>

信息沟通平台的建立，改变了家校沟通的频率和方式，也重新建构了教师和家长的权力与角色。家校沟通逐渐从过去偶发性的“仪式性沟通”转变为日常性沟通。新的互动方式，不再拘泥于传统的家长会、学校开放日式的“仪式性沟通”，而是通过技术平台搭建了一个可以随时沟通的“全景敞视广场”。家校沟通的方式，也从过去的“事件性”电话沟通、“仪式性”的活动沟通<sup>[19]</sup>，变成了频繁的日常信息互动。教师和家长的角色也发生了转变。教师从过去的“信息提供者”“仪式讲演者”变成了“家-校广场”的监督员，制定规范、提供信息、监督执行、评价分级。家长也从过去的“忠实听众”、家庭养育者

转变为教师任务的执行人、子女学习的辅导者和助力子女竞争的后勤资源保障者。

新的“家校互动”方式有效调动了家庭参与，助力子女学业发展，却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问题。江苏的一位家长愤怒大呼，“我就退出家长群怎么了”<sup>[20]</sup>，引来众多家长的呼应和媒体报道，反映出家长在新的“家校互动”方式中承受的压力和衍生的情绪，以及对这种互动方式的抗拒。通过技术平台搭建的家校沟通模式，对家长群体产生巨大的压力。第一，“广场奖惩”具有“示众效应”，对个体产生荣誉和羞辱的双重压力。第二，教师与家长间的权力结构是垂直的，教师权力高于家长权力。家长需要接受教师的信息及判断，但不能公开质疑。家长清楚地知道教室是由教师掌控的。对于教室内的信息，教师可见但家长不可见。第三，规范化评判以“病理诊断”的价值取向发布信息，将学生的“优秀”和“落后”置于家长某种完成或未完成的因果行动链中，让家长“丈量已经完成的事情与应当完成的事情之间的距离”<sup>[21]80</sup>，对他们形成持续的压力。第四，沟通平台制造了家长间横向的竞争。教师发布的评价与分类信息，可以有效触动家长间竞争，让他们不断投入时间、劳动和金钱，帮助子女力争上游。但是不同家长的参与意愿、时间、能力和资源是不同的，因此也产生了情感痛苦、自暴自弃的家长。“广场-全景敞视”的家校互动机制衍生制约每个人的机制。

### 三、专业主义与家长参与：自我改造的知识主体

学校对家长的治理，显然不能单纯依靠权威治理，而是藉由某种知识的灌输作为信息源头，使其内化为家长的自我知识，引导家长思考与行动，建构知识的主体性。这其中，既要让家长认识到参与子女教育的必要性，又要给家长提供规范性和策略性知识以配合学校教育，同时还要提供诊断性的病理学知识不断修正家长的参与行为。而这一切实现的基础，需要依赖由社会科学家生产的关于学校教育的一套专业性论述和事实性的知识(factual knowledge)。学校基于科学的专业知识与技术形成的专业主义及其意识传递，既合理化了自身，又巧妙地将机构管理与个体自我管理复杂地结合起来。<sup>[22]80</sup>

长期以来，学校一直在塑造一种救赎性的制度机构(redemptive institutions)形象。社会的进步、完善和个人的成功都依赖于学校的教育。<sup>[23]148</sup>特别是对家长而言，接受学校教育对子女精神和物质财富的获取必不可少。加之，从20世纪80年代起，西方许多国家采用新右派的市场化教育政策，注重个人自由选择与竞争，因而教育事务进入了个人选择与决定的范畴。<sup>[23]</sup>

#### (一)教育价值的哲学知识与教育成功的生物系统知识

学校向家长传递的第一类知识是有关教育价值的哲学知识。教育是“导人”向善的活动，将人从一种不理想的状态教化成另外一种理想的状态。孔子的教育哲学可概括为“学以成人”，柏拉图则明确提出以城邦介入的方式引人向善。现代社会因分工细化、价值多元，教育主体对教育的规范性价值与工具性价值重视程度不一。学校是一个价值冲突的场域，既要回应学者偏重教育规范性价值的要求，又要回应企业和家长偏重于教育工具性价值的需要。但是学校作为一个机构的重要价值是促成教育利益相关者的默认共识。学校常以各种方式向家长传递“教育是重要的”的信息，以换取自身“真理政权”(regimes of truth)的合法性基础和家长对子女教育的重视。教育不仅可以“成人”，更重要的是可以(维持)改变“出身”，实现社会阶层的流动。

学校向家长传递的另外一类知识就是教育成功的生物系统知识，即学生的学业成功依赖于学校和家长的互动。曾几何时，教育成功的“功绩主义”泛滥，努力与天赋被视为教育成功与否的关键。<sup>[24]</sup>家

长与学校各安其事，互无往来。后来借由技术发展和社会科学知识的传播，学生教育成功的生物系统知识(biological system knowledge)传播开来<sup>[25][26][27]</sup>，即学生的发展受家庭、学校和社会多重系统影响，家长参与对学生的成功不可或缺。因此，学校不但要引导家长参与学校教育，而且更重要的是传递如何参与的知识，以巩固、深化学校的主导权和运行秩序。

## (二)规范性知识与策略性知识

在真诚地诉说价值真理基础上，学校需要进一步向家长传递教育参与的规范性知识与行动策略知识，让家长成为自我改造的主体，进而清楚地认识到合适行为的内涵与方式，避免行为失当。

规范性知识的首要表征是制造的(make up)“分类学”(classification)知识，以区分什么是“正常的”和“反常的”、“优秀的”和“落后的”，以及“道德的”和“不道德的”。通过规范性知识的分类，引导家长以特定的方式考虑和看待学校里发生的事情<sup>[28]</sup>，以趋同“正常”“优秀”和“道德”的行为，避免“反常”“落后”和“不道德”行为。所以，引导子女认同学校的价值和规范、帮助子女提升学习成绩并强调尊敬师长则会成为“正常”的家长，反之则落入“反常”行列。

在重视教育工具性价值的学校内，规范性知识的分类显得更加明确易懂。课程知识以确定的形式和顺序呈现，标准答案和学业成绩成为分配资源的硬性指标，“成绩高低”便成为区分“优秀”与“落后”的标准，知识和道德由此产生了关联。进而，围绕提升成绩的策略性知识也就产生了。

策略性知识是如何具体行动的技术信息。教师通常以“优秀学生”及其家长作为范例，引导其他家长配合学校参与子女教育。如，家长在家是否向子女强调教育的重要性、是否按照教师要求督促子女按时完成学习任务并辅导子女学习，是否通过课外补习的方式帮助子女提升成绩等。规范性知识与策略性知识强调家长通过沉思凝视自身，进而提炼自我。这种凝视和提炼，有强烈的道德意味，即家长作为子女教育的主要责任人，是否是“合格的”，是否还有“有待改进的”地方。通过教师不断地灌输、诊断和反馈，家长逐渐成为自我治理的主体。同时，在家校互动的“广场”内，教师还会不断引导家长相互观看，以分类学的知识进行评价，以激发竞争，形成一个自动化的相互观看和彼此监督的机制。

## (三)病理学知识与表现性知识

在“广场-全景敞视”的平台内，教师需要对家长参与的效果进行不断地诊断和反馈，将“偏离常轨者”(deviants)转变为“正常人”。教师向家长传递的是一种病理学诊断知识。藉由规范化的评价标准，以效能观向成员诉说真理，指出家长参与的问题所在，开列药方，达到规范家长行为的目的。不断评估成为监控参与效果的重要手段，而评估结果则成为资源分配与奖励的依据。

如果以成绩排序作为诊断的重要标准，这种排序本身就衍生出一种优劣象征和道德意味。优秀不但证明子女的能力与品质，还可赢得尊严和赞扬，相反则成为“班级”的负担和“有问题”的人，进而产生羞愧感。而家长作为主要代理人，则会因子女成绩优劣而被判定为优秀或合格与否，具备浓烈的道德意味。因此，诊断结果会进一步激发家长的羞愧感与进取心，使其不断提高自我要求，反思参与行为，强化投资，让子女回归“正常”或者进入“优秀者”行列。

在“广场-全景敞视”的沟通模式中，教师和家长逐渐共同建构出一套表现性知识。表现性知识普遍聚焦于成绩、态度、努力程度和家长的具体参与行为，其共同点是具有条目化、具体化、可辨识及可操作性的评估系统特征。由此，教师成为学生表现信息的报幕人，并以此机制改善家长的参与方式。具体而言，在家校沟通的“信息广场”内，教师通过可量化的学习效果及其排列(如汉字听写正确率及其等级)等信息作为例证，指出学生学习的不足，推动家长凝思自我，修正参与策略。而家长则以明确、

清晰可辨的行为(如按照教师要求听写汉字,合格后签字)向教师显示自己的付出,以回应教师的压力和其他家长的观看压力。表现性知识是“广场”沟通平台生产出来的特定脉络知识,让家长在自我改造的同时也产生彼此监督和示范作用,强化了社会公众心理。

#### 四、家长参与中的教育公平

学校通过“广场-全景敞视”的权力控制机制与专业主义的知识传递方式,将家长塑造成自我改造和自我治理的知识主体,有效地触动了家长的积极参与和相互竞争,实现了经济、有效的家校互动。其运作原理是讲述真理,运用竞争逻辑产生社会道德体系,进而使家长成为有责任的教育代理人。通过这种途径,学校将治理的焦点转移到家长身上,让家长成为自我实践的主体。

然而,此种形态的家校互动机制会引发家长间的激烈竞争,制造家长的危机意识、焦虑以及不断地参与投入。在“广场-全景敞视”的可视化平台内,一切个体的位置藉由教师的评价与分类都清晰可见。位置象征的品级、能力与道德优越性激发家长不断参与,帮助子女力争上游。“鸡娃”现象形象地表征了家长参与的焦虑与投入,“牛娃”现象则突显出家长群体间的竞争焦虑,助力子女遥遥领先他人以获得稀缺资源。家长参与已经衍变为全面的教育卷入。在空间上有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全面参与;在时间向度上衍变成为长期的日常参与;在投入资本上,衍变成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身体与时间投入)和社会资本的全面投入;在参与事务上,既有常规的学业辅导,回应教师的各种要求,又有课外教育(补习)的投资与陪同,以及不断地收集各种信息;在参与目标上,既要帮助子女完成常规课业与升学目标,又要协助子女成为德、智、体、艺全面发展的人。可见,家长的角色已经超越单纯的“经纪人”,成为集合投资人和“教师”于一身,世界上最忙碌、最焦虑的无收入“职业人”。

当然,家长参与问题超出了“家校互动”的权力机制,它和教育的全球化、市场经济、技术发展和资源的不均衡分配等诸多因素联系在一起。不可否认,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家长主义”时代,家长的财富和愿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子女的教育结果。教育分层与社会分层显现出同构性。<sup>[29]</sup>家长参与子女教育,包含了家长对子女的爱,但更多是家长借助家庭资本帮助子女争夺社会稀缺资本以获得稳定的社会经济地位的竞争过程。教育参与由此演变成为一场家长间的“军备竞赛”,引发了明显的社会“剧场效应”<sup>①</sup>。同时,基于家长群体内部的差异性,此种形态又会造成“不同型态的演出(enactment),其中涉及诠释(interpretation)、协商(negotiation)、转译(translation)、再脉络化(recontextualization)与行动(action)等过程。这是因为,单一性的教育政策无法契合多元化的教育情境”。<sup>[30]</sup>

家长群体并非同质性群体,它的异质性特征往往让家长以不同的方式诠释与转译参与的要求。这种转译很可能是反感、修改甚至排斥。不过,鉴于教师与家长间权力的不平衡性以及学校教育的重要性,家长一般不会公开质疑教师的互动需求;只是由于参与能力差异和“广场”评价引发的竞争压力,让家长更多以疲于应付和不满的心态卷入其中。

胡佛-登普西(Hoover-Dempsey)和桑德勒(Sandler)在《家长为什么参与子女教育》(1997)一文中提到,家长是否参与子女教育取决于他们角色信念、自我效能感和是否收到教师与子女的参与要求,而家长如何参与则受制于他们的知识技能、时间与精力,以及教师与子女的要求。<sup>[31]</sup>因此,具备资本与能

① 剧场效应即在剧场里看戏,如果前面有一个人不遵守规则站起来看,后面的人为了看清楚也必须站起来,否则他们根本看不见,最后整个剧场的人都站着看戏。

力的家长会成为积极认同并参与学校教育的“顺从者”，接受学校的文化目标和制度化手段，成为受教师欢迎的人；有些能力不足的家长会成为“革新主义者”，他们希望通过教育改变子女命运，但不能通过合适的方式参与教育，如通过与教师建立紧密的私人关系的方式参与。“仪式主义”的家长则有可能放弃了对学校教育的希望，但又不得罪教师，以“应付公事”的状态参与子女教育。至于“逃避主义”和“背叛”的家长则可能不认同学校教育和教师的方式，放弃了教育参与，成为游离于学校教育之外或者反抗学校教育的人。<sup>[33]</sup>因此，虽然“广场-全景敞视”的家校互动方式能够有效监督家长参与，但家长的文化能力、信念与资本存在差异，可能会造成参与的两极分化，损害教育公平。

首先，社会优势阶层往往受教育程度高，熟悉学校教授的知识和运行方式，有能力帮助子女发展相关认知技能和文化品位，能有效地与教师交流，增加子女的学校适应度。<sup>[9][33][34]</sup>所以，面对教师的要求，优势阶层的家长往往能够游刃有余地予以回应，帮助子女在班级建立“优势”地位。社会弱势阶层往往是学校教育的失败者，缺少相关知识和能力，自然也就无法有效配合教师的要求，常常给教师留下不重视子女教育的印象。

其次，优势阶层和弱势阶层职业的灵活度不同，导致了他们参与子女教育的时间不同。从事体力劳动的家长，需要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工作，自然没有时间参与子女教育和回应教师的要求。而从事高级脑力劳动职业的家长，依靠知识和技能的周期性投入，工作时间灵活，有更多时间参与子女教育，回应教师要求。因此，在“广场-全景敞视”的家校互动模式中，优势阶层家长更容易获得教师的青睐，建立优势地位。

最后，不同家长群体因为经济资本存量的差异，购买教育市场产品的能力不同，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家长参与的两极分化。<sup>[35]</sup>高度发展的课外教育市场以规模庞大、种类齐全、专业细化、顾客中心的模式，有效满足了家长购买教育服务的各种需求。经济资本丰厚的家长可以通过教育市场购买服务，帮助子女提升能力；而经济资本不足的群体因为购买不起或者购买不足，导致子女在学校的表现落后，进一步加剧了教育的两极化趋势。

## 五、结语

“家长主义”时代的到来，促进了家庭和学校对儿童教育发展的合流趋势，显现出双方基于技术的信息共享和更加紧密的互动。不过，因互动双方权力失衡，塑造出一种新的“广场-全景敞视”的权力控制机制。教师利用信息互动平台公布学生学习信息，并进行登记、分类和评价，进行“广场式”的奖励和惩罚，触动围观效应与家长间的竞争。同时，教师利用专业主义的知识，给家长灌输多重性的价值知识、规范知识、策略知识等，把家长改造为积极行动的知识主体，以利于家长的主动参与。不过，技术平台的持续监控给家长群体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同时，因为没有考虑到家长参与能力和资源的平等问题，导致家校互动机制在成就部分家庭的同时也排斥了、甚至牺牲了另外一部分家庭。<sup>[36]</sup>从这个意义上讲，家长参与成为一种社会经济地位的较量，不仅改变了传统的家校互动模式，也成为文化与社会再生产的隐秘机制。

教育的全球化趋势和市场化发展，给家长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信息。但是由于学校占有文凭授予、教育教学和“控制”家长的权力，“广场-全景敞视”的互动机制制造了一种“市场驱动力”，即家长们为了确保子女的教育竞争力而到市场购买教育服务，引发了课外教育市场的蓬勃发展，乃至上市公司的

资本化操作。课外教育市场的大规模发展,不但加重了家长和子女的负担,而且引发了学校内外教育系统的双重建设,耗费了大量教育资源。特别是当家长参与的目标指向子女通过考试获得未来心仪的工作职位时,所有的家庭投入和学生的学习都是为了提高成绩。它所引发的是全社会的零和竞争,一个孩子成功了,另一个孩子就被抛弃了。<sup>[2]15</sup>

虽然国家对家校互动、特别是对基于技术信息平台的互动做了诸多限制,但是互动的权力不平等关系并没有彻底改变。有形与无形的“广场-全景敞视”机制依旧存在。学校要重新反思基于技术的家校互动机制,尊重家长与学生的隐私权,均衡家校权利关系,体现教育的公共性和民主特征。首先,要在理论、规范和操作程序上厘清家长和学校的权利边界,保证家校互动能够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进行。美国联邦政府1974年出台《家庭教育权利与隐私法案》(*Family Educational Rights and Privacy Act*),明确规定了学校和家长使用学生信息的权利边界,可为我们提供借鉴。其次,需要从根本上反思“广场-全景敞视”机制给家长灌输的知识的性质问题。一切试图控制家长以利于学校治理的知识都不是教育性知识。学校引导家长的教育性知识应该致力于帮助家长理解子女天性,帮助家长理解子女何以如此。最后,要加强家校间的差异性互动,减少统一性互动,并形成规范和模式。教师要尊重家长群体的巨大差异性,针对不同家庭的具体情况互动。此外,有必要激发家长群体内部力量,培养“公共家长”。“公共家长”不仅努力对自己子女的成长负责,而且努力成为对子女班级同学成长负责的家长。甚至,“公共家长”可以在社区范围内形成“公益力量”,进行家庭间的资源互补,创造和谐的教育环境。

#### 参考文献:

- [1] Phillip, B. The “Third Wave”: Education and the ideology of parentocracy[J].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1990(1): 65-86.
- [2] 马赛厄斯·德普克,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M].吴娴,鲁敏儿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9:14.
- [3] 이종각. 교육열 올라로 보기:그 정체는 무엇이며 어떻게 다루어야 하나? [M]. 서울:원미사,2003:68.
- [4] 马相龠. 中国家庭教育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5-6.
- [5] 柯林斯,哈尔弗森.教育大变局:技术时代重新思考教育[M].陈家刚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91-95.
- [6] 詹姆斯·J·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M].邓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380.
- [7] Ho, S. C. Parent involvement: A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definitions and explanations[J]. *Educational Journal*, 1995(23): 39-68.
- [8] Barton C., Drake C., Perez J. G., Louis K. S. Ecologies of parental engagement in urban education[J]. *Educational Researcher*, 2004(33): 3-12.
- [9] Lareau, A. Home advantage: School class and parental intervention in elementary education. Rowman&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0: 8.
- [10] Reglin, G. Project reading and writing (R. A. W.): Home visitations and the school involvement of high-risk families[J]. *Education*, 2002(13): 153-160.
- [11] Waterman, J. M. Understanding the impact of parent school involvement on children's educational outcomes[J]. *Th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1998(91): 370-381.
- [12] Vincent, C. Parent empowerment? Collective action and inaction in education[J]. *Oxford Review of Education*, 1996(4): 465-482.
- [13] Corinne E. Barrett DeWiele1. Jason D. Edgerton. Parentocracy revisited: Still a relevant concept for understanding middle class educational advantage? [J]. *Interchange*, 2016(47): 189-210.
- [14] Stevenson, D. L., Baker, D. P. Shadow education and allocation in formal schooling: Transition to university in Japan[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2(6): 1639-1657.
- [15] Zhao, T. Y., Hwang, S. H. Parents' motivations for choosing private tutoring in urban China[J]. *Studies in Humanities*, 2012(3): 371-401.
- [16] Kim, T. J. Shadow education: School quality and demand for private tutoring in Korea[R]. KEDI School Working Paper Series, 2004: 4-21.
- [17] Collins, A, Halverson, R. The second educational revolution: Rethinking education in the age of technology[J]. *Journal of Computer Assisted Learning*, 2010(26): 18-27.



- [18] 福柯. 规训与惩罚[M]. 刘北成, 杨远婴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6.
- [19] 赵同友. 家长教育参与: 行动、信念与脉络[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79-82.
- [20] 杨海琴. “我就退出家长群怎么了”, 别让家长群变“压力群”[N]. 中国青年报. 2020-11-01, [http://news.cyol.com/app/2020-11/01/content\\_18835817.htm](http://news.cyol.com/app/2020-11/01/content_18835817.htm).
- [21] 福柯. 自我技术[M]. 汪民安 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80.
- [22] Popkewitz, T. A political sociology' of education reform: Power/knowledge in teaching, teacher education, and research[M]. New York: Teacher College Press, 1991: 80.
- [23] 姜添辉. 不均教育结果的成因: 理性资本与不同社会阶级家长的教育行动[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0(6): 19-26.
- [24] Turner, R. Sponsored and contest mobility and the school system[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60, 25: 855-867.
- [25] Seginer, R. Parents' educational involvement: A developmental ecology perspective [J]. Parenting Science and Practice, 2006, 6(1): 1-48
- [26] Gordon, I. J. The effects of parent involvement on schooling. In Vrandt, R. S. (Eds.) Partners: Parents and Schools[M]. Washington DC: Association for Supervision an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Press, 1979: 4-25.
- [27] Epstein, J. Longitudinal effects of family-school-person interactions on student outcomes [J]. Research in Sociology of Education and Socialization, 1983(4): 101-127.
- [28] Diaz, J. D. A cultural history of reforming math for all[M]. Routledge, 2018: 4.
- [29] 程家福, 董美英, 陈松林, 窦艳. 高等学校分层与社会各阶层入学机会均等问题研究[J]. 中国高教研究, 2017(3): 48-56.
- [30] 姜添辉. 生物政治学视角下的教师表现力: 一个全球性的议题[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0(10): 1-20.
- [31] Hoover-Dempsey, K. V. , Sandler, H. M.. Why do parents become involved in their children's education? [J]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1997(1): 3-42.
- [32] 渠敬东. 缺席与断裂: 有关失范的社会学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52.
- [33] 布尔迪厄. 区分: 判断力的批判[M]. 刘晖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112.
- [34] Weis, L., Cipollone, A. 'Class work': Producing privilege and social mobility in elite US secondary schools[J].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2013(5-6): 701-722.
- [35] 李忠路, 邱泽奇. 家庭背景如何影响儿童学业成就? ——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差异分析[J]. 社会学研究, 2016(4): 121-144.
- [36] 沈洪成. 激活优势: 家长主义浪潮下的家长参与的群体差异[J]. 社会, 2020(2): 168-203.

(责任编辑 于小艳)

## ABSTRACT

### Educational Citizen and Rise of Parentological Studies: Rebranding and Academic Strategies for Parents' Substantive Participation in Education [Korea] (LEE Jong-gak)

Page 5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iagnosi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in-depth reasons for the lack of effectiveness despite the government's policy on parental participation in education. It checks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public opinion on education and the situation in which the public opinion on education is being ignored, and confirms the existence of situations where you don't have to listen. Disregard for parents is due to the lack of parents' social presence, which is linked like a chain link due to difficulties in raising the voices of parents and insensitivity to parents' voices. This chain link is an in-depth reason that hinders the realization of parental independent and substantive participation in education. In order to cut off the chain of in-depth reasons, the first challenge is to form a social presence for parents. In order to support parents to take root in their social presence as an educational subject, resistance and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against the hostile culture towards parents are presented as tasks. It presents rebranding and academic strategies as a way to support solving these tasks. For rebranding, it points out the problems in the "social parent" and presents the "educational citizen" plan. Parent academic strategy is a task that theoretically supports educational subjectivity and educational participation while reflecting the three major identities of parents. The academic strategy can be largely composed of three parts: First, take a new perspective to ask questions and understand parents correctly; Second, look at education from the standpoint of parents; Third, resist a culture that is hostile to parents. Academic strategies not only involve parents, but also have a wide range of pedagogical significance. The government and educational circles should treat the problem of parents' quality with the awareness of teachers' quality. It is necessary to introduce a management strategy for education enthusiasm at the national level so that the government and the education community have the perspective and ability to nudge the educational energy of parents. The academic strategy aims for a symbiotic relationship in which the three-party relationship promotes mutual evolution through balanced research among the three actors of the state, teachers, and students-parent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ree actors is a key task in establishing educational democracy and at the same time can be a new secret of sustainable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The contents of teacher training education should include the knowledge of parents, and the professionalism of teachers should be transformed into a service professional culture that overcomes the exclusive professionalism of parents and actively accepts the participation of educational citizens. The policy principle of parental education participation should be changed to "activation after normalization" rather than "activation".

**Key words:** parental participation in education; parental social presenc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parent identity; education enthusiasm; academic strategy; education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participation normalization policy

(Proofreader: YU Hui)

### Historical Form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arental Educational Involvement Policies in Korea

[Korea] (LEE Soo-kwang & OH Jae-Gil)

Page 26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analyze the historical form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arental Educational Involvement Policies in Korea. The research results are as follows: After the "5. 31 Education Reforms" promoted by the Kim Young-sam government, the social and legal status of parents in education has been improved. Before the "5. 31 Education Reforms", parents were recognized as supporters and volunteers in school. Through the "5. 31 Education Reforms", however, parents began to be recognized as educational sovereigns. With the School Governing Board being introduced, parents could participate in decision-making of school management. In addition, various support policies for parental empowerment were introduced. However, there needs to be some improvement of these Parental Educational Involvement Policies. First, the unequal relationship fixation caused by unbalanced power structure between school staffs including teachers and parents has persisted. Second, "Policy-Environment discord" and "Normative Policy discord" have been generated. Third, policies for improving the Collaborative Leadership of teachers are not established enough. Fourth, the policy to establish mutual communication system between parents and school is insufficient. Lastly, policies that take advantage of parent enthusiasm for education as a strategic asset are not sufficient. For post-Covid-19 era, a newly revised social deal on education should be established in Korea. In the new deal on education, Parental Educational Involvement Policies are needed to be more progressive and democratic.

**Key words:** social and legal status of parents; educational sovereigns; support policies for parental empowerment; mutual communication system.

(Proofreader: YU Hui)

### The Rights Boundary, Interaction Mechanism and Educational Equity Between Home and School in Parentocracy Era (ZHAO Tongyou)

Page 41

**Abstract:** The structural changes in global education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apital and market economy have once

again highlighted the important role of parents in their children's education. Parentocracy offers a good opportunity to reconstruct the power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s and the school, and to pursue educational equity. However, the existence of the school as a rigid system, through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of technology, establish an unequal power control mechanism to interact with parents, which cultivates parents to be the subject of self-reform knowledge and triggers mutual supervision and capital competition among parents, strengthening the cultural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functions of education. Research suggest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boundary of rights between parents and schools in theory and norms. It is necessary to fundamentally reflect on the nature of the knowledge that schools instill in parents, and to distinguish the educational and non-educational knowledge.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empower parents to develop 'public parents' within parent group, in order to reduce the burden on teachers and create a fair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Key words:** Parentocracy; parental educational involvement; home-school interaction; educational equity

(Proofreader: YU Hui)

### **“Claim Too Much Power”: A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Home-School Conflicts in S School of G City**

(LIU Fuqi & XIE Ailei & XI Changhua)

Page 50

**Abstract:** By using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is study tries to examine the causes of home-school conflicts in S school of G city. We pay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statements of parents and teachers on their own positions and the power assumptions behind them in 15 home-school conflicts cases. The data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power claimed and exercised by parents and teachers are perceived by their counterparts as too much. We conceptualize this phenomenon as “Claim Too Much Power”. Th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of this study is that it emphasizes the shift from a realism perspective to a constructivism perspective in analyzing home-school conflicts. The power view of parents is based on consumerism to a certain extent, while the power view of school related subjects is based on professionalism to a certain extent.

**Key words:** home-school conflict;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onsumerism; professionalism

(Proofreader: YU Hui)

### **Teachers' Paid Compensated Tuition: An In-depth Interpretation and Solution** (LIN Dan & LI Guang)

Page 60

**Abstract:** The long-standing problem of teachers' paid compensated tuition is, in a sense, not simply an educational issue, nor simply an issue of teacher's ethics, but a reflection of the soci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ety in the social subsystem of education. The external causes of the problem mainly include: the overall anxiety of people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e influence of the “theatre effect” on the real values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failure of some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to monitor the situation. The internal roots of teachers' paid compensated tuition mainly include the fact that the phenomenon of teachers' paid compensated tuition is itself a huge market of “hit it off”, and that some teachers have a low level of teacher ethics. There are three way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eachers' paid compensated tuition: first, creating a value identity of “shouldn't have” by strengthening teachers' ethics, so that teachers “do not want” paid compensated tuition; second, creating a “redundant” exit effect by raising teachers' income, so that they are “unwilling” to do paid compensated tuition; third, creating an institutionalized “daunting” preventive mechanism, so that teachers “cannot” do paid compensated tuition.

**Key words:** teachers' paid compensated tuition; theatre effect; strengthening teachers' ethics

(Proofreader: YAN Fei)

### **Towards “Positive”: The New Trend of School Discipline Policy in Australian Government Schools**

(YIN Yali & MA Zaoming & SHE Yongxuan)

Page 66

**Abstract:** In the 21st century, under the promotion of inclusive education concept and various social factors, the education discipline system in Australian government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has undergone a change from the 1990s' “zero tolerance” to “positive” from legislation to practice. The newly revised School Discipline Policy in most Australian states in 2019 serves as a model for the “positive” educational discipline policy. It aims to protect the individual rights of students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personality, it also covers the trinity of school governance with discipline guidelines, discipline improvement and multiple disciplines. As an extension of the School Discipline Policy, Australian government schools explore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education discipline, it includes creating a restorative environment and developing peer mediation and meeting mediation skills. The types of disciplinary incidents are divided step by step, and the overall trend is towards “positive” disciplinary action. Based on the educational concept of “fairness and justice”, hierarchical disciplinary measures and restorative disciplinary guarantee, the “positive” education discipline reflects new changes in the value orientation and opens a new direc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discipline in government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Australia.

**Key words:** Australia; government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positive discipline”; “zero tolerance discipline”; school discipline policy

(Proofreader: YU Hui)

(Table of contents proofreader: YU Hui)